

民國史研究的啓示

吳相湘

——中華民國建國史的撰述不容再遲緩了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元旦，舉行開國紀念典禮的時候，一般人將會很自然地想到這出現於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國的花甲大慶已快來臨。

就我國歷代文集中的壽序看來，傳統習俗對花甲慶典非常重視。近四五十年來日文「慶祝某某教授還曆紀念論文集」的洋洋大觀，又可見日本人於此也有同感。四年前在美國也出現慶祝六十壽辰論文集，更可說海內外同風一俗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中央研究院於此會特創新例，自刊行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以後，繼續刊行慶祝胡適、董作賓、趙元任、李芳桂諸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對中華民國說來，建國六十年自然應該大事慶祝。而今年即民國五十九年也就是西曆一九七〇年，是國父制訂中華民國國號的六十五周年，也是中國革命同盟會創立六十五周年。就歷史意義說，這「六十五周年」比較「花甲慶典」只有過之無不及——國父自傳有云：「自革命同盟會

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專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及乙巳（一九〇五年）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成矣。於是乃敢定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一)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發佈軍政府宣言，提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大綱領，並說明措施之序分爲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時期。根據這一宣言的解釋：「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爲右敬塘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建立民國：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

平等而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這就是國父自傳所謂「中華民國之思想」的主體。在今日自然是多數人耳熟能詳，並且具有身與其事行使「參政權」的經驗，甚至國民小學學生說話作文也慣用「我是中華民國好國民」。但在六十五年前這却是新思想，即「國民」一詞的最早釋義與應用距今也還不到七十年！

一九〇一年五月，秦力山王寵惠諸人在日本東京創刊「國民報」，是革命排滿的最早刊物，也是「國民」一詞最初釋義的首一紀錄，其中「說國民」、「亡國篇」、「中國滅亡論」諸篇再三反覆指出「吾國之稱民者賤之則曰小民，鄙之則曰窮民」；甚至被呼之爲「黔首」、「蟻民」、「奴才」，「中國自開國以來未嘗有國民也」。並指出必需了解：「天地之上，同是動物也，而有人類禽獸之分；同是人類也，而有白黃紅黑

之分；即同是一民也，而有國民奴隸之分。何謂國民？曰：天使吾爲民，而吾能盡其民者也。何謂奴隸？天使吾爲民，而卒不咸其爲民者也。故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尙獨立。此奴隸與國民之別也。「所謂國民者，有參政權之謂也。所謂權也者……在民主之國，須經國民全體代表所許可，定爲憲法，布之通國」。比對上錄軍政府宣言，這一論點應是其最早淵源。

國民報刊行至第四期後中止，一九〇三年夏將這四期合成「彙編」，其發刊詞有云：「是報始創於辛丑（一九〇一），長獅一吼，百獸震恐。蓋吾國開幕民族主義之第一齣至此始交排場。倡獨立之玄素，播革命之種，光焰萬丈，開作璀璨自由之花」。事實上這一報紙確已盡到時代前驅的責任。一九〇四年十月，連橫（臺灣通史之作者）、章士釗、陳獨秀等在上海創辦「國民日報」，其發刊詞開始即云：「國民二字之名義與範圍，東方民族之所不解」。經過若干解說之後復指出「此報出世之期爲國民重生之日」。這更把握時勢的趨向。自「蘇報案」以後若干青年尤其留日學生的思想確已開始轉變。中國革命同盟會之能組織成立就是憑藉這一主要因素。

一九〇七年一月，楊度獨力創刊「中國新報」，倡言「金鐵主義」即經濟的軍國主義，而所以組織此經濟的軍國者乃政治，則主張君主立憲。對於同盟會的主義綱領自然有不同意的批評。

是年七月章炳麟因特撰「中華民國解」一文於「民報」第十五號加以闡解（收入「章氏叢書」太炎文錄別錄卷一，惜無標點符號，不如民報之易讀）。

中華民國國號制訂後六年，也就是同盟會成立後六年，在「失敗是成功之母」的啓示與鼓勵下，終於有志竟成，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創立成功。但革命黨人沒有恪遵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的措施之序進行除惡務盡，遂使袁世凱得以利用舊勢力推行帝制，而仰承袁世凱意志活動最力的一人即上述之楊度。

其時，同盟會已擴大改組爲國民黨，在袁世凱重大壓力下，進行討袁工作，幸各方共秉「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昭示，項城獨夫終致家叛親離而死亡。中華民國國號又重見光輝。民國五年七月國父在上海對國會議員演說，檢討得失，其中特別強調指出：「諸君知中華民國之意義乎？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爲僕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待之者。歐美之共和國，創建遠在吾國之前，二十世紀之國家，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爲自足。共和政體爲代表政體，世界各國隸於此旗幟之下者，如希臘則有貴族奴隸之階級，直可稱之曰專制共和；如美國則已有十四省樹立直接民權之規模；而瑞士則全乎直接民權制度也。雖吾人今既專制而成代議政體，然何可固步自封落於人後，故今後國民當奮振全神，於世界發現一光芒萬丈之奇采，俾更進而底於直接民權之域」。今按民國五年即一九

一六年，國父所謂「十餘年」應即上文所述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間，其企盼建立一名實相副施行直接民權的國家之誠心真履躍紙端。而國父所謂「研究」應包含選用「民」與「共和」二字的反覆考慮以及英文譯名的適當。抑不僅此，國父更譯述美國林肯名言以儆家喻戶曉。

按林肯名言，一九〇二年梁啟超曾試譯而未適原義。一九一六年即民國五年，胡適在美留學時也曾試譯作兩種：（一）、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爲之政府。（二）、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爲民之政府。胡適於此並未以爲滿意。翌年即民國六年，國父刊行「會議通則」（後易名「民權初步」）時則譯爲「爲民而有、爲民而治、爲民而享」。民國八年撰「三民主義」文言本時仍沿用這一譯文，至民國十年六月演講「三民主義的具體辦法」中才將其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並且指出：「林肯所主張的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主張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國父另有一題贈居正條幅：「美語曰民國者，民之國也，爲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惜未署年月，今推考應在民國五六年間。再三反覆推敲以企求爲「民」字作更進一步說明的苦心由此可以顯現。

民國八九年間，國內若干軍閥官僚倡言所謂「聯省自治」，這與國父「以縣爲自治單位實行直接民權」的主張完全背馳甚至對立。國父會再三撰文指出民國有名無實多年亂離與痛苦的教訓，民國十二年一月更發表「中國革命史」，沈痛指出有名無實的原因：辛亥革命以後黨人未遵行

革命方略之錯誤，「十二年來所以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者，皆此役階之厲也」。「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末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爲新治，第三流弊由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不幸國人始終沒有體認國父的苦心 and 主張，若干陰謀者更反其道而行。民國九年湖南倡議「自治」之初，毛澤東就連續發表兩篇論文提出「湖南共和國」的口號。這是不是受當時蘇俄在西伯利亞設立「遠東共和國」的啓示，今無直接文獻可證；但是時毛澤東在湖南與李大劍等在北平等地發展共產細胞的運動已開始了。其後毛澤東更利用內亂外患擴大力量。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七日，毛澤東等共黨匪徒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福建出現「中華共和國」都是公開企圖摧毀中華民國的。經國民政府予以重大打擊，毛匪又採取軍事退守政治反攻策略，竄踞陝北後決定將其幻想的所謂「工農共和國」改爲「人民共和國」，以適應廣泛範圍——但毛匪再三強調這一「人民」是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處於相對地位。民國二十五年，毛匪又再度改變，將原議「人民共和國」換作「民主共和國」。旋且公開宣稱：「它將是而且一定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勝利的過程中產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國」。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毛匪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更欺騙世人說：「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

共和國」。對日抗戰末期，又推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至民國三十八年七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十月成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復妄言欺世說國父的民權主義與其「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其實國父早已指出「民國」與「共和國」意義截然不同。陳獨秀「最後見解」也指出蘇俄「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近二十年來大陸血腥事實更證明上述「中華民國之意義」，「中國革命史」的遠見與預言不幸而言中。揭露了「人民共和國」的陰謀真相。

六十五年來的歷史顯示：陰謀野心家屢次假藉歪曲比附我國號，實因民主爲時代的主流，而大多數國人沒有知識，不知不覺，只供驅使；少數號稱知識份子又沒有虛心求知，一知半解，自不能判別是非利害，加以名利薰心，甘爲人利用；更沒有人記得國父的遺教了。

如上所述：我們在自由區的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口說手寫「中華民國國民」。但在今日大陸就決不容許這種自由了，如果有人如此必將遭受嚴重懲罰。經過這一慘痛教訓，我們應該如何力行國父遺教使中華民國名實相副呢？不要讓歷史再重演了。

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是國父一生希望的新紀元。按當時革命黨人的說法是「聯合革命」的開始。

就今日所得見的史料研究，湖南留日學生編

行的「遊學譯編」第十冊（一九〇三年六月發行）中之「民族主義之教育」一文是公開倡導「聯合革命」的最早刊物。它揭示中國革命應以下等社會爲革命事業的中堅，中等社會爲革命事業的前列。並且提出對於中等社會教育之事業有四：一曰結集特別團體，二曰流通秘密之書報，三曰組織公共之機關，四曰鼓舞進取之風尚。對於下等社會之教育有三：一曰與秘密社會爲伍，轉移其舊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轉移其舊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二曰與勞動社會爲伍，改革其舊知識而注入之以新知識，變易其舊習慣，而注入之以新習慣。三曰：與軍人社會爲伍，破壞其舊勢力而聳動之以新勢力，排斥其舊專功，而歌羨之以新專功。

這一提示在當時確是新觀念。在這以前國父領導的廣州之役（一八九五）惠州之役（一九〇〇）都是以下層秘密會黨爲中堅和基礎。一九〇〇年唐才常等自立軍起義也是以秘密會黨爲基礎，但由於康梁關係，少數讀書人曾參與其事。不過科舉出身的人仍不屑與革命「造反」的人物來往，吳稚暉就曾再三憶述他自己於一九〇二年在東京不願一見孫先生的往事。現在「遊學譯編」敢於以「中等社會」爲革命前列，即對國內新設學堂學生與留日留歐學生而言，這些人爲數不過一二萬，但已够充當「酵母」職責了。

一九〇三年夏，黃中黃（章士釗）譯述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爲「大革命家孫逸仙」。在篇首序言中一再指出「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爲」、「談與中國者不可脫孫逸仙三字」。於是

孫先生在國內及留日學生心目中就前後判若兩人。

國民革命的群象基礎擴大了，革命領袖地位也確立了。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國革命同盟會就在這兩大憑藉下成立。這是原來分散各地各自爲戰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的大「聯合革命」，也是中層社會即讀書人知識份子與下層社會秘密會黨軍人大「聯合革命」的開始；這不僅給孫先生希望「一新紀元」，事實上可說是千百年來國人體認團結產生力量的新紀錄。在這一團圓結之後六年中華民國就建立成功。

不幸如國父在「八年十月十日」一文中所指出：民國成立以後，「維持官僚之勢力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祇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將順，而漸被同化矣。以是對於開國之進行，多附官僚之主張，不願入黨之信誓。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悉置之腦後，視爲理想難行」。在這種情勢下，中華民國脆弱嫩芽就被袁世凱摧毀，民國五年「中華帝國」洪憲紀元出現了。在這一事實未發現以前，國內著名知識份子如章太炎梁啟超等都曾信任袁世凱，多數國人更相信當時「非袁不可」袁不會爲惡過甚。外國朝野尤其認定袁是「強人」（日本例外）。等到洪憲帝制出現，中外才驚醒。

袁世凱新華春夢只有八十三日，違反時代潮流，自是主因。但國內各方的討袁行動能結合一體更是促使他迅速崩潰死亡的決定因素。在這些討袁行動有國父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也有梁啟超章太炎李根源岑春煊蔡鍔等與孫先生結合相應的

護國軍。正如吳稚暉民國十四年在「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一文中所指陳：「三十年來，自有改革運動，新派兩黨合作而勝利者可云三次：一則戊戌以前，一即辛亥革命，一即洪憲革命是也」。

毛匪對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竄改爲「聯俄聯共」並歪曲事實指爲「又一次聯合戰線」。實則陳獨秀時代之「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早已坦陳：國父對第三國際代表提議的「平行合作」自始即加以拒絕，最後才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真正是「容共」而溶化之。

國父拒絕「平行合作」的建議，過去兩次「聯合革命」的悲歡離合慘痛教訓以外，深知國人对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實在沒有認識，而少數號稱知識份子輒喜撿拾日本人的牙慧以自炫，談不到認識了解和信仰。例如同盟會時代的劉申叔（師培）留日時曾鼓吹民族主義其妻何震會發刊「天義報」，倡言破壞固有社會，實行女界革命。但不一年劉何即作一百八十度轉變，回國向兩江總督端方自首悔罪並揭發同盟會秘密。民國元年江亢虎自命爲社會主義正宗組織社會黨，國父會不憚煩勞對其黨徒作連續三日之演講，說明「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希望大家認識了解，更再三致意「我國社會主義流行伊始，尤望黨人持和平之態度」。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有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統不清的社會共產主義，傳佈在無知識的兵士中和工人裏面」。戴季陶因此請問國父的意見。國父的答復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這確是一種危險，因無爲論在那一國，他們各種思想，都是有系統的，社會上對於有系統的思想的觀察批評，也是有系統的。政治運動是政治運動，經濟運動是經濟運動，各有各的系統，都隨着人文進化的大潮流，自自然然的進步。如果沒有特別的壓力，像我國從前那樣的治，決不會有十分激烈的變態發生出來的。中國的社會思想和生活還沒有發達，人民知識沒有普及，國家的民主的建設，還沒有基礎的時候，這種不健全的思想，的確是危險的。」

國父在這同一談話中又強調指出：「中國現在不但工人沒有知識，連號稱知識階級裏面的人也是一樣沒有知識。工人沒有知識，就是一切新舊知識都沒有的；知識階級裏面的人就是有害的知識，沒有有益的知識。對於毫無知識的，給他一個知識是容易。對於號稱有知識的，教他判別是非利害，倒是很難」。這一段談話自然是對當時國內一般情形而言，但有一項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早在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李大釗即已在「新青年」宣傳馬克斯和布爾塞維克的勝利了。

如吳稚暉一再指陳：陳獨秀在國內人事關係是非常複雜的。李大釗也是一樣，並且他與立意派湯化龍淵源深切，其後又隸研究系。陳李曾留學日本，但其學術水準是不高的，對馬克斯學說的認識了解更是膚淺的。事實上至民國廿餘年國內出版界印行自德文譯出的「資本論」內容與原文尚有出入，甚至馬克斯討論我國清成豐朝主張改革貨幣的戶部官員王茂蔭，譯者即不知何許人

，強譯作「王猛殿」。至抗戰時吳晗才指出其主名。即此一端可見五四時期知識階級所認識的馬克斯與共產主義只是皮毛而已。

五四運動的發祥地是北京大學，研究系與這一股潮流早有合流共趨的跡象。民國九年三月，梁啟超等一行由歐洲歸國後，研究系還有組黨的動機，丁文江張君勳兩人於此尤其興趣，很想以胡適作橋梁打通北大路線，表面不擁戴一個黨魁，而暗中則以梁啟超與蔡元培爲其領導人物，以文化運動作政治運動的前驅；嗣因張東蓀反對這項黨教合一的計劃，這一計劃遂被擱置。而陳獨秀李大劍等則已由馬克斯研究會進而組成中國共產黨，旋又分往廣東陳炯明與洛陽吳佩孚處積極進行宣傳組織工作，實行了以文化運動作政治運動的計劃。同時江亢虎在訪問遠東共和國與莫斯科等處回國以後又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口號。

如上述：國父嚴拒第三國際代表「平行合作」的提議，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父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決心，在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手批鄧澤如函報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俄國革命之初，不過行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鬪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實爲對於民族主義；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爲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待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乃俄國革命黨……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且又爲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這時救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吾黨。……如

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這最後一句話，正如吳稚暉所了解：「彼（國父）蓋早知彼如常在可無問題，彼死恐無人能予束制，則絕之棄之可斷然行之也」。不幸國父不過花甲即辭人世，一切問題都隨之而發生。

民國二十三年蔣廷黻遊俄時眼見彼得大帝的身影，大斯拉夫主義罩上紅色外衣更顯得刺眼。民國二十九年德蘇戰爭爆發，尤其民國三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史達林大聲歌頌「大俄羅斯民族」，證明國父所謂俄人用力最大者實爲民族主義。至於近二十年來大陸的事實表現，國父在民生主義中再三指出的「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獲得證實。

六十年來，中華民國的多災多難，可以說是陰謀野心家千方百計以阻撓民有民治民享理想的施行。半個世紀的時間，一切事實雖證明國父的遠見和三民主義是真理。但爲獲致這一「證明」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非常慘重巨大了。「歷史本身是不重演的，但愚蠢的人偏偏要去重演歷史」。我們能不能虛心誠意面對「歷史的鏡子」接受教訓呢？

(III)

早在民國元年三月十七日，國父因黃興胡漢民等九十七人之請咨文參議院討論設國史院：「撰輯中華民國建國史，頒示海內，以垂法戒，而鞏邦基」。其後半月國父即解除臨時大總統職。但民國八年一月國父對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設立國史編纂處擬具「國史前編」體例仍表示嚴正觀

點。不幸迄今半個世紀過去了，花甲大慶也快來臨，「中華民國建國史」還在虛無縹緲間。覆按上述「昭是非、垂法戒、鞏邦基」的初議，史官失職，實在應受最嚴厲處罰。

民國卅七年，張繼主持國史館時，曾討論民國史體例問題，可以說是秉承民國元年初議，不幸局勢突變，未成定案而中止，羅家倫主持國史館逾十年，是民國史上擔任此一職務時間最久的，且正是臺灣安定進步之際，不幸竟是年華虛度一事無成，只創一千古史官未有之新例，即以國史館編行國父年譜，其中有關倫敦蒙難史實不遵照國父自述與孫文學說。並且特別炫示外國學人（見美國加州大學刊行：史扶鄰著「孫逸仙與革命之起源」）。這可說足以比美吳興「打倒孔家店」的。今後民國史及國父傳記體例是否應該遵行這一路線？實在是國史館新任館長亟宜提出討論的問題。而「中華民國建國史」無法在花甲慶典問世，已爲鐵的事實，但必須在這一慶典時將體例確定，應是最低要求。

多年以來，國史館及其他主管史料機關不注意收集反對方面資料。這是令人不解的。不有黑那能顯出白？國父年譜之支離破碎，不能給人系統知識，即坐此弊，今後必需改正。要知外國有關我國國史資料及論著太多了，如不收集參考，如何能顯觀史實全貌。自然經費是一問題，這就只好希望政府寬列預算，民間基金會多予捐助了。中華民國國民所以託天安命的就是這一部充滿「先烈之血主義之花」的輝煌光榮歷史，朝野人士實在不能再於此忽略了。